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话语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并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作为一种跨学科努力,人们把话语政治和国际关系进行联姻,旨在说明和理解国际政治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国家之间争夺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场所,从而有可能揭示世界政治背后一个更为复杂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本期刊发的三篇有关“话语与国际关系”文章分别从理论和经验上对话语政治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本组文章的选题与策划得到刘永涛博士的鼎力相助,我们对此谨表谢忱。

# 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 语言、理论和“邪恶轴心”

刘永涛

【内容提要】作者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认识出发点,对(不)安全文化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指出话语本身可成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活动。把语言作为安全政治分析的主要单位,旨在超越长期以来仅把外界物质要素作为(不)安全文化来源的看法,看似“客观”、“自然”的安全政治问题,往往是国家之间彼此话语诠释和建构的产物,这类话语实践反过来可以成为制造国家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作者以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为例,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与制造冲突紧张之间存在着一定因果关系。于是,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话语;社会实践;(不)安全;“邪恶轴心”论

【作者简介】刘永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00(2008)05-0019-07

长期以来,语言一直被认为是人类交流和反映客观事物的工具。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里,话语(或曰语言使用)如同其他社会文化概念一样,只是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附带现象而被置于政治分析的次要地位。的确,如果语言的功能仅仅是作为人们从事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或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镜子”,那么国际关系研究者就不会对话语发生什么兴趣,因为那是语言(哲学)学家们的研究领域。

然而,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有关话语的社会

属性以及权力特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常识。除了作为交流和反映现实的工具之外,语言还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即它可被人们用于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和建构不同的“现实”。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开始思考有关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如何利用语言从事对外及安全政策活动,如何通过话语

\* 本文是作者参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宗教和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项目研究的成果。

建构“世界政治”,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尽管这些研究所探讨的话题和选择的视角不尽相同,但它们均强调了话语在国际关系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把语言作为独立的政治分析单位加以对待。

本文重点讨论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的问题,并从国际关系角度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说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那么它有可能是造成国家之间(不)安全的一个来源。它试图超越传统理论关于安全威胁由外界“客观物质”实体所构成的认识。根据该假设,一个国家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不仅是有关政策的语言表述,而且还可能引起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社会互动并产生影响。这并不是说话语实践以外的其他社会实践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试图说明话语实践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把话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排除寻找建立一定的因果关系和提出一般性归纳的学术努力。譬如,一定的语言使用(或滥用)是否与国际稳定(或冲突)之间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国家之间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便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的主题展开讨论。首先,扼要阐述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活动这一基本认识所依赖的哲学基础,侧重说明“言语行动”理论所提出的见识。其次,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在批判性地理解哥本哈根学派有关“安全化”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的含义需要从一定的(不)安全环境中去理解,这类话语本身乃是(不)安全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定的安全话语既可以是建构安全条件的工具,也可以是制造(不)安全文化的来源。最后,以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于2002年初提出的“邪恶轴心”论为例,从经验上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可以成为引发国家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鉴于篇幅所限,并意识到处于强势地位的话语更具有主导性和关键性,本文省略了其他国家对“邪恶轴心”论所做的话语回应。

### 一 话语乃是社会实践

长期以来,语言一直被看做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传统的语言观认为,一定的社会实践是通过

“做”而不是靠“说”去进行的。这种认识把语言使用分离出去,并没有认识到语言使用乃是从事社会实践的见识。

然而,语言不单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它还是构成社会现实的重要物质要素。语言具有社会及文化的基础,而且带有实践的特征。话语不仅是一种实践,而且是一种社会实践。人们利用语言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及文化活动。语言不仅是人们从事交流和再现现实的工具,而且还具有影响社会生活中其他者思想和行为的功能。话语的社会性在于,人们利用语言去影响、劝服甚至改变社会生活中其他人的想法、信念和行为。有意义的语言使用乃是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这是不同于传统语言观的显要之处。

因此,人们不仅仅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也开始关注并重视对语言的使用,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去从事并完成某件事情,关注人们所讲的话在听者中间产生何种反应和效果。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L. Austin)的“言语行动”理论为这类关注提供了一种视角。该理论的核心是,人们可以利用语言文字做各种事情。那么,人们利用语言到底做什么呢?根据“言语行动”理论,某个语言陈述可能同时包含着不同的行动,其中包括“意在行为”的言语行动,即一

近年来,从语言角度对国际关系给予关注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参见钱皓、钱晓明:《大众话语中的美国形象与中美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王子昌:《解构美国话语霸权——对“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但兴悟:《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郑华:《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郑华:《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布什访华——从美方的三次记者招待会谈起》,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惠耕田:《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袁正清:《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心的一项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贺炜:《认同、话语建构与美朝核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1期;等等。

定的语言叙述不仅表达着一种行动,而且对听者造成影响和结果。话语作为社会实践,可以合法地做好事,也可以非法地干坏事。譬如,人们既利用语言进行问候或批评,也利用语言做出许诺、道歉或欺骗等。有时候,人们试图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谋求影响、改变甚至“操纵”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使他人相信或从事……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于是,在(滥用)社会权力的作用下,一定的话语成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支配和压迫的实践活动,并使后者成为话语的受害者,从而制造了社会不公平。譬如,在西方社会,政客利用接近媒体之便对选民进行劝说或操纵,媒体通过提供一些信息对读者或观众施加影响等。当然,人们利用语言做事情也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一定的话语既影响社会中的其他者,也受其他者所影响。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说话的方式,均受到说话者所处的场合以及听者身份的影响。正是这种语言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语言使用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

“言语行动”理论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基础框架。尽管该理论受到一些质疑并在经验上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难题,但是,“言语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即人们利用语言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无疑是有见识的。话语也许不像其他社会实践那样直接地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结构及变化,但它的确“间接地和从心理方面起着作用”。

与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对语言含义的关切,一定的话语往往引起多种含义。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进行考察,人们发现语言的含义往往来自人们对语言的具体使用;其含义不仅来自于词语的差异关系,而且由社会价值所赋予。语言被看做是不稳定的、易变的和流动的,其含义作为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也被不断地加以明确。一个逐渐达成的共识是,人们通过一定的语言方式去理解和接触社会世界,其所获得及生产的有关知识与其说是对这个世界的客观反映,倒不如说是以一定的语言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知识被看做是一定的历史及文化环境下的具体产物。这并不是说话语的含义没有稳定性,而是说其稳定性是相对的。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始终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的含义是被赋予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

产生的。

因此,如果说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那么对话语进行适当的分析乃是必要的。话语分析倾向于把语言看做是社会现实的物质要素。语言不仅仅被看做是符号系统,它还被看做是社会分析的核心对象和丰富来源。在这里,语言是作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加以看待的。人们关注文本的叙述方式和修辞,关注不同文本之间的话语结构。通过观察一定的语言在经验上的应用,人们发现其含义不断产生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世界是如何不断地被建构。如果说社会世界是由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所建构,那么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是,通过对建立在“言语行动”理论基础上的有关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理解,人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第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符号系统,它还是建构社会“事实”的重要工具。语言使用乃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去做并完成各种期待中的事情。语言的含义是在一定社会及文化互动中产生并发生变化。第二,话语不是单一或孤立的实践活动,而是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密切联系。一定话语实践往往引发其他社会实践或事件的发生。第三,作为一定的社会实践方式,所有的话语(或者说对语言的使用)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充满伦理和规范的特征。人们利用语言做合法的事情,也做不合法的事情。当然,语言上的不端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

## 二 话语建构(不)安全环境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探索影响国家对外及安全

Teun A. Van Dijk, "Discourse and Manipulation,"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6, Vol 17, No 3, p. 360. 关于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可参阅 John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就话语本身而言,人们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它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中对语言的使用;另一方面,它可理解为对社会过程加以限制和建构,或者说,一定的语言使用规定着讲话者的行动选择,并引起讲话者与听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而产生并推动一定的社会实践。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对后者感兴趣。

[美]罗宾·洛尔夫著,刘丰海等译:《语言的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罗宾·洛尔夫:《语言的战争》,第112页。

政策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安全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政治“现实主义”关注外来威胁的客观性,强调对物质实力分配以及对别国威胁企图的认知。在使国家免遭安全威胁方面,物质力量被认为充当着重要角色。相比之下,语言则作为社会文化附属现象而被搁置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地位,即使得到关注,也只是将其作为外交谈判或斡旋之类的工具。语言属于缺乏社会特征的个人现象,而且只是被视为一种符号系统,其语言使用问题并未受到充分重视。

然而,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物质实力的重视。尽管国际政治涉及国家利益、威慑能力和实力分配,但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也是各国之间争夺观念及话语主导权的场所。后者往往是通过竞争性话语而展开的。把话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者对话语发生兴趣),主要缘于语言能够在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领域“做事情”,甚至建构世界政治的“现实”。

于是,从理论上揭示并说明语言使用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必要。在欧洲,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化”过程与“言语行动”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的联系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话语结构。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国家之间通过一定的言语行动建构起相互理解和信任,并在应付外部安全威胁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愿意共同采取紧急措施去对付其安全威胁。安全化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具体的话语结构”,“在安全话语中,一定的事件被戏剧化,使其显得极为重要;于是,通过把某个事件说成是一种安全难题,国家行为体便可声称有必要利用特殊的手段去应对它”。换句话说,安全难题是被“说”成的,而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犹如某个事件经过语言渲染而被“政治化”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样,某个事件经过一定的话语建构或语言作用的过程而被“安全化”,即成为一桩“安全难题”。

显然,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吸取了“言语行动”理论,其“安全化”概念依赖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言语就是行动。该学派认为,对安全进行叙述乃是安全行为的重要形式。正是这类有关安全的叙述为国家决策者随后采取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如上所述,对“安全”的

叙述过程乃是对“安全难题或威胁”进行话语建构的过程,它把某种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有价值的安全对象描述为正在遭受来自外界力量的威胁。安全威胁的来源依赖于语言上的叙述和诠释,而不一定是客观存在。于是,在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研究中,语言始终处于政治分析的主要地位,属于“核心的、独立的研究对象”。

于是,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安全”并非是一种客观状态,安全威胁不仅可以由外部物质实力变化所造成——当然,这种物质的含义尚有待于依据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而定——而且还可以通过人们使用特定的安全政治话语而被建构成为“社会事实”。在这里,语言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交流功能。它不仅用于描述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来源,而且在建构安全“威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过,该学派在说明话语建构“安全化”含义方面,似乎更受到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影响,即话语建构“安全难题”的含义来自于对话语本身——而不是将其放在一定的语境里——加以解读。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的含义是在一定的(不)安全环境及条件下产生并加以理解的。因此,人们需要考虑到这类话语在国际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国家之间所引起的进一步(不)安全实践互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91.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26.

Henrik Larsen,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Ben Tonra and Thomas Christiansen, eds., *Rethinking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4.

后结构主义有关语言含义问题大体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全部含义存在于语言本身,即关注对文本含义的解读;另一种观点认为,单一文本没有含义,只有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里,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含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概念似乎更倾向于接受前一种观点。参见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Ole Waever, “The EU as a Security Actor: Reflections from a Pessimistic Constructivist on Post Sovereign Security Orders,” in Morto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998.

者发表对外及安全政策演讲时,演讲者不仅试图使听者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他和听者都在以微妙的方式,通过语言确定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之间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关系。听者会对演讲者的话语含义进行理解并做出反应,这种理解和反应或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者通过其他的(不)安全实践表现出来。从根本上讲,安全话语的含义不仅是某个国家单向或纯物质行为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是国家之间在一定的安全政治环境下互动的产物。

在国际关系中,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对语言政策 战略的系统设计和实施,成为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设计出的一套话语系统,去建构本国所面临着的“外来威胁”、“敌人”、“对外政策危机”或“外交事件”等,从而为确立自我政治身份和动用国家战略资源或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提供合法理由。第二,如果一个国家在安全政治身份上藐视或仇恨另一个国家,那么前者往往会从语言上“诋毁”、“破坏”甚至“铲除”它的敌人。第三,在其他权力形式的作用下,一个国家甚至可以凭借语言——而不是直接利用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实力——迫使另一个国家去做它本不愿意做或违背其自身政治意志的事情。于是,语言使用和安全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被确立起来。也就是说,语言可以是制造矛盾和冲突的来源。因此,看上去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国家之间相互诠释和建构的产物,而这种诠释和建构又是造成紧张的政治竞争的来源。揭示赋予“(不)安全”含义的过程乃是充满政治及权力争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看上去是“客观的”、“自然的”。于是,看似现实的、理所当然的“安全难题”,实际上是话语作用的结果。

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争夺,而且还表现在这种争夺是以对话语含义展开竞争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中,各国(尤其大国)对于共同面对的现实赋予何种话语含义而不断地展开竞争,即表现为争夺话语主导权。一些大国试图通过赋予话语含义的方式,主导和确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事件,并规定国家之间安全政治关系问题的基调,以便在推行本国对外及安全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或具有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争夺话语方面的支配权成为国家对外及

安全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面。一些国家会通过打压竞争对手的声音和语言,将它们的话语边缘化,以突出和实现自身的对外及安全政策利益和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维持一种占支配(甚至霸权)地位的话语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一方面,经过精心设计、安排和整理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系统,为本国在对外及安全领域提供处于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使本国需要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去维持和确保这种话语支配权或霸权。

因此,作为社会实践,语言使用在国际关系中乃是一种具有伦理和规范价值的实践活动。如果说安全冲突和稳定均与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那么有关语言政策 战略的问题,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如何避免使用引起安全冲突的语言变得尤其重要。

### 三 “邪恶轴心”论制造美国的敌人

2002年1月29日,乔治·W.布什发表他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演讲,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所主导的“反恐战争”,即便是国内主要议题也被放在“战争”话语的语境里加以阐述。在演讲中,布什首次提出“邪恶轴心”论。他称: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并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以及它们的恐怖主义联盟,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旨在威胁世界的和平”。随后,“邪恶轴心”论正式进入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系统。

“邪恶轴心”是由布什总统的首席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杜撰出来的一个说法,而且是对先前另一名撰稿人所提出的“邪恶仇恨”说法的修改。据说,选择“邪恶”这个词,旨在强调“反恐战争”不仅是美国和恐怖主义分子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较量,而且还反映它们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道德价值冲突;“轴心”一词则试图使人联想起二战时期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参阅 John W. Dietrich, ed., *The George W. Bush Foreign Policy Reader: Presidential Speeches with Commentary*, New York: M. E. Shap, 2005, p. 46.

George W. Bush,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见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据说,布什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国家,曾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并引起是否应该把伊朗从“邪恶轴心”名单中撤下,换上其他国家的辩论。参阅 Mel Gurtov, *Superpower on Cusade: The Bush Doctrine in U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p. 146;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Failing Empire: U. 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Cold Wa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67.

布什政府为扩大“反恐战争”范围,从语言上精心设计出“邪恶轴心”说法,旨在开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新阶段。“邪恶轴心”论不仅想表达布什政府意识到全球“反恐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说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即如果想避免再次受到外来袭击,美国必须在敌人获得武器或发动袭击之前,“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不仅如此,作为美国政府对外及安全政策的一种实践,美国总统利用“邪恶轴心”论至少“做”了这样几桩事情:第一,它试图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黑白分明的“邪恶世界”和“文明世界”,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带。第二,它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制造出新的敌人,并确定“邪恶轴心”国家在政治身份上对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善”的力量。第三,它试图为美国政府打算对“邪恶”国家采取暴力行动提供“正当理由”。现代美国总统大都意识到,从具有宗教色彩的“善恶”对立去建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价值冲突,有助于美国政府动员国内公众舆论并动用国家战备资源。在美国人的信仰里,“邪恶”乃是上帝的敌人化身,因此必须予以铲除。

不过,布什政府通过话语所做的这些事情面临着挑战。第一,许多人质疑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邪恶轴心”。朝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和伊拉克均无直接联系。长期以来,伊朗和伊拉克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持续八年的残酷战争。此外,从这两个国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来看,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是一个“世俗”领导人,对国内宗教团体实施过严厉措施,其与“基地”组织的任何联系应该会是“紧张对立的”;伊朗则被美国认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不过,伊朗人主要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而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许多成员追随伊斯兰教逊尼派,因此,伊朗与恐怖主义分子的进一步联系显得“不太可能”。如果说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三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均被美国政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而且它们均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有强烈的反美情绪。

第二,尽管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在美国政府眼里是“无赖国家”,但是,它们在反恐问题上并没有与

美国产生严重对立。事实上,九一一事件后,朝鲜政府发表声明重申反对恐怖主义,并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伊朗总统谴责了九一一事件,并向美国人民表示哀悼。不仅如此,伊朗政府令人意外地支持并协助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采取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人逮捕了一些“基地”恐怖主义分子,甚至允许美国军队在伊朗领土从事反恐搜索和救援行动。尽管伊拉克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对九一一事件给予谴责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直接联系。

第三,美国政府在讨伐“邪恶”的名义下谋求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国际道德及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从语言上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个国家揉在一起,将它们称为“邪恶轴心”,使得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不安全环境变得更为突出,也使得随后的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在这两个地区陷入难堪的境地。在东北亚,朝鲜本来正在逐步落实1994年与美国签订的《美朝框架协议》,通过缓和步骤最终停止它的核武器计划。然而,布什政府改变美国对朝政策话语及实践,使朝鲜半岛不安全局势再度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棘手难题。在中东,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在海湾战争中已经受到重挫,并处于联合国机构的严密监督下。然而,美国政府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占领这个国家,使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至于伊朗,如上所述,九一一事件不久,伊朗和美国一度在阿富汗战争中进行过合作。但是,“邪恶轴心”论挫败了美伊之间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而且影响到伊朗国内的政治变化。

人类进入21世纪时,全球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美国也在继续享有冷战结束以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尽管布什本人被认为在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不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最终在2001年当选美

---

2002年夏季,美国总统布什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同年5月在德国的演讲,6月在西点军校的演讲)重申了美国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不久,“先发制人”思想——作为“布什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John W. Dietrich, ed., *The George W. Bush Foreign Policy Reader: Presidential Speeches with Commentary*, p. 46.

国总统。不过,到了 2004年布什竞选总统连任时,这个世界、美国以及布什本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尤其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安全政治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和危险。在美国国内,由于政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在朝鲜核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许多美国人重新感到个人、家庭及国家处于不安全环境中。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更多地意识到,霸权不仅带来利益和机会,也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风险。至于布什本人,他在 2004年竞选连任中则自称是一个“战争总统”了。

显然,利用“邪恶轴心”论谋求扩大全球“反恐战争”范围,引起美国与有关国家之间更为深刻的敌意和冲突。事实上,当美国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时,这些国家会对这种说法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做出回应,因为它构成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实践的一部分。布什政府后来放弃“邪恶轴心”的说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政府意识到,这种话语实践给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制造了麻烦和困境。

#### 四 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本身、安全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邪恶轴心”论角度,探讨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以及(不)安全实践的问题。它把“言语行动”理论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即语言的功能不单是作为人们从事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或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镜子”,人们还利用语言从事并完成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去“做”各种事情。

通过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这一话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本文断定,在话语政治与国家间敌意和冲突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一研究给人们提供了以下认识。第一,把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活动,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理解和说明安全威胁及冲突来源的视角。它超越了传统上把安全威胁及冲突来源狭隘地确定为“外来的”、“客观的”物质力量的观点。话语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要素成为不可忽

视的政治分析单位。话语分析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法。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会利用语言从事各种对外及安全政策活动。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既是促进安全环境的实践活动,也是制造不安全文化的来源。关于利用话语建构政治身份的途径,国家既可以从语言上“诋毁”、“破坏”甚至“铲除”它的敌人,也可以通过话语实践“胁迫”他者去做违反其自我意志或意愿的事情,这些不仅揭示了话语政治在国际关系层面所具有的社会互动性,而且说明话语作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所具有的权力特征。第三,国际政治不仅是国家之间争夺物质实力及利益分配的领域,而且还是它们之间彼此争夺话语主导权的场所。在国际关系中,一定的话语含义是在一定的社会及政治的环境下产生的,或者说是权力的作用下所赋予的。一个国家往往非常在意另一个国家说了什么,并对另一个国家的言论——而不一定是物质行动——做出反应。因此,制定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乃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及和谐、避免战争与冲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此外,本文在探讨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的过程中,涉及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指出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并不意味着语言与其他形式的(不)安全行为相脱离,恰恰相反,一定的(不)安全话语实践往往由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实践所引起,或者引起随后的(不)安全实践。譬如,为了扩大全球“反恐战争”的范围,美国政府利用“邪恶轴心”论,在世界政治中建构起一个“邪恶”联盟,一方面为美国制造出新的敌人,另一方面为美国政府随后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和占领提供“理由”。因此,探讨国际关系领域中一定的话语实践,应该把它与其他的(不)安全实践形式联系起来加以看待。二是探讨国际关系领域中一定的话语实践,并不排除寻求具有一般意义的陈述,也不排除谋求建立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努力,尽管这种学术努力面临着经验上难以实证的困难。

[收稿日期:2008-02-25]

[修回日期:2008-04-02]

[责任编辑:谭秀英]

## Abstracts

### **Ten Feature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a Reform Era**

**Wang Yizhou** (6)

After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diplomacy was gradually shown as the following nine features: 1. combination among three needs (development, sovereignty, and responsibility); 2. a low-profile at international stage; 3. moderate appeal for reform 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4. a multiple complex of internal institutions in char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 a balanced posi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blocs; 6. "Harmonious World" as both strategy and notion in forming; 7. renewed principle on non-intervention; 8. "putting people first" thinking as a new conduct code; 9.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policy-making; and 10. gradual and orderly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All of these features present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and open up a new door for IR studies in this country.

### **Discourse as (In) security Practice: Theory and Rhetoric of "Axis of Evil"**

**Lin Yongtao** (19)

Taking "speech act" theory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reconsiders sources of (in) security culture, and argues that discourse itself as social acts can be a source of (in) security culture. Treating language as a major unit of analysis in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s to go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external material factors are taken as sources of (in) security culture. Politics of (in) security, seemingly "objective" and "natural", is in fact the product socially and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and interpreted by nation-states.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in turn, can give rise to hostility and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states. The study of Bush Administration's rhetoric of "axis of evil"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roper use of language and the creation of tensions among the nation-states.

### **Language,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n Postconstructivism**

**Sun Jisheng** (26)

Postconstructivism, drawing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takes language,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e core of the theory. It holds that identity is a kind of social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and should be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by language. During crisis or uncertain times, language can be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As material power is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language can also form a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restrains the actor's sense of Self and choice of action. During